

4.

中国民族关系紧张的根源是什么？

欧立德 (Mark Elliott)

不久之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方人，包括许多学者，都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种族同质的国家。因此，中国与其他拥有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的国家不同。那些国家都在尝试调和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期望与统治人民的现实，但中国却不用，因为它没有“民族问题”。而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中国人”。

说句公道话，这种假设是有一定根据的。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汉族—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汉族占总人口的91.51%，比20世纪中叶约94%还有所下降—而且国家领导人中没有非汉族人士。由于非汉族群体绝大多数聚居于人们经常前往的东部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因此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实，即除汉族人以外，中国还生活着一个相当大的所谓“少数民族”。时至今日，这个“少数民族”大约有1.12亿人，被国家划分为55个不同类别。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1.12亿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人口数量几乎相当于世界第十一人口大国日本。今天他们居住的土地，占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二以上，几乎覆盖了中国全部的陆上边界（包括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和其他

九个国家)。这让人更加清楚认识到，现代中国复杂的民族特征是国家重要的一环。这的确可以视作一个定义性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官方对这一现状的表述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句口号每年都会例行出现在许多有关民族事务的文章中。

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悲剧事件，打消了人们，甚至是那些偶然观察中国的人，对中国民族同质性的误解。这清楚表明政府与中国部分——当然不是全部——民族之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紧张关系。这些事件，包括2008年在西藏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以及此后几年间发生的一百多件自焚事件，都与1980年代末的流血抗议、“文革”期间大量寺庙被毁和1959年的拉萨平叛等事件一样，成为漫长而悲伤的回忆。近来又有其他证据表明中国的确存在“民族问题”，如内蒙古部分地区偶尔会发生抗议活动；但毫无疑问，2009年后在乌鲁木齐和全国其他城市，包括北京，所发生的爆炸和袭击事件，均登上媒体的头条新闻。几乎所有这些夺走了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生命的事件，都被归咎于维吾尔族“恐怖分子”。他们的大本营，就是西方媒体现在经常称为中国“难以驾驭”（或“难以管理”）的“远西”地区（Far West），即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Tarim Basin）中的绿洲小镇和城市。

民族关系紧张问题

独立记者一般都被禁止在新疆和西藏工作，纸媒和网络媒体在中国各地亦都受到严格监控。因此，我们几乎不可能核实任何事件的具体细节，或了解有关人员的动机，使我们难以回答这个令人遗憾的记录中所浮现出来的明显问题：究竟非汉族人——主要是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人——为何而感到如此不快呢？

虽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而言，却十分关键。不出所料的是，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问的是谁。

对于大多数中国公民，包括几乎所有汉族人来说，他们的回答会是，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之所以不快，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一小撮“捣乱分子”制造了完全独立的假希望，并提出脱离中国后可能带来的好处。那些抱有这种希望的人——或者被认为抱有这种希望的人——使自己和国家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他们争取独立的梦想不单会注定在失望之中以失败告终，还会因为威胁到国家的完整而受到打击。

大多数汉族居民还会进一步争辩说，只要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仔仔细细看看周围，就会意识到他们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多么幸运。虽然历史使这些民族陷入了愚昧状态，但他们最终摆脱了先前的悲惨境地。在过去几十年里，非汉族社会结束了人类剥削的不公平现象、消除贫困、消灭疾病、延长寿命、扩大教育，以及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令他们的整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都是因为中共的关注和政府慷慨投入资源。因此，这种观点指，非汉族人应该对这个国家深存感激。有些人拒绝承认这种恩惠，反而大声抗议他们觉得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甚至以反对党和国家的名义进行暴力活动——在大多数普通市民眼里，这都是大逆不道和不合情理的。

如果问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快？——他们通常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事实上，大多数人会承认，全靠他们的土地在历史上并入中国版图，生活才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但是，他们会补充道，想想我们付出的代价。尽管政府作出保证——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亲口向我们的领导人作出的保证——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正在消失，而我们亦未能按照个人意愿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虽然我们生活在所谓的“自治”地区，但实际上，我们只有很小或者根本没有权力管理地方事务。我们不能在学校里教授孩子们本土语言，甚至不能保护我们的人民享有随自己喜好穿着打扮、

梳头发或给孩子改名字的权利。如果我们敢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就立刻会被贴上“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的标签，被抓起来，遭到恐吓和监禁。

一些维吾尔族人可能会继续指出，他们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即使在新疆也得不到同工同酬和平等就业的机会，被迫携带特别的身份证件，以及受到美国人所说的种族定性问题的困扰。许多人会说，如果你像我们一样生活在这里，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内部殖民主义，9·11事件后全世界的人都下意识对伊斯兰产生恐惧，营造出一种极端化的仇恨，而这正是共产党声称要消除的仇恨。

这种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在少数民族与安全机构之间（情况一直如此），而且—更令人担忧的—也是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这样的现象还相对罕见。

没有人，甚至没有政府，会假装问题不存在。有一些专门的官僚机构在致力设法缓和局势，还有其他机构在努力控制局势。无数出现在政治和学术期刊的文章都是从所有（允许的）角度讨论问题，然而在大众媒体上，几乎不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公开讨论。一些勇敢的人，如作家王力雄和网志作者唯色（Woesser）这对已婚夫妇，公开哀叹似乎在不断恶化的局势。越发严厉的镇压、更严密的监视、不断下降的自由度和日益加剧的惩罚，似乎在打压反抗政府的声音，导致民族关系的继续恶化。这不仅会令文化走向衰落，还会让所有中国公民，无论汉族还是非汉族人，的安全都陷入危机。他们建议结束他们认为毫无希望的政府策略，实行更宽容的政策和高度自治。然而，至少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政府有意向这个方向转变。

历史的视角

在几乎所有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20世纪初，国民党认为非汉族人原本全都是“中国人”，并期望他们最终能融入汉族文化。这种观点所带有的专制态度，对国民党政权争取非汉族群体的支持，并没有什么好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机会，拒绝实行“汉化”，并承诺给予非汉族人更多的自治权，甚至一度提供了脱离中国的权利。尽管这项规定在1949年后制定第一部宪法很久之前就已经被废除，但该文件仍然包含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政策。

假如毛泽东在长征期间没有得到非汉族人的支持，他的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公开谴责国民党奉行“大汉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要尊重非汉族人的尊严。这种更为宽容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9年）被暂时搁置，但在1980年代又被重新提出，而当时正值是对少数民族普遍采取相对自由政策之际。到1990年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担心要求自治的呼声愈来愈高，主要来自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区，所以决定收紧大部分对少数民族的自由政策。2000年代初，随着跨国恐怖主义组织，如基地组织（Al Qaeda）的出现，新疆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

随着21世纪国家继续一步步从帝国模式过渡至国家治理模式，20世纪的解决办法似乎已经失效。中国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紧张，无论对汉族人为主的中国政府，还是对非汉族人来说，现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双方都以自己的角度回顾过去并看待历史。中国共产党视苏联解体的宿命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事，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此归咎于苏联“错误”的民族政策，指他们下放太多的权力予非俄罗斯的地方官员。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蒙古族——当中很少有人真正支持分裂——以美国、澳洲和加拿大为例，担心自己会面对与这些国家的原居民相似的宿命，即他们的生活方式已被消灭，而他们经过修饰、被掏空的

文化则保存在博物馆供游客参观。双方都不太愿意公开阐述这些类比（在中国，“原居民”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禁忌），但我们不难看到在日益紧张的僵局中激发双方的担忧。

民族关系紧张—两种解释

共产主义典范为汉族人和非汉族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培养了他们之间共同的公民意识。然而，随着时间过去，中国共产党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欠中国边疆人民什么，就像许多汉族人指责非汉族人未能意识到所有他们欠共产党的东西一样。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欲望，还是“中国梦”，似乎都无法将两者结合起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也没有太大希望。当我们思考当前影响中国民族关系的种种弊病所产生的根本原因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所以出现分裂，部分原因在于在中共的领导下，开放了以前规模较小、自给自足的省级经济体，并将强大的市场力量引入社会。自1979年，尤其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项开放政策使愈来愈多汉族人来到边疆生活，希望获得致富的机会，而当中许多机会都与1999年由政府发起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相关。大量汉族移民—其中很少有人愿意费神学习当地语言—来到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和蒙古族人居住的城镇，意味着非汉族人在自己家乡的人数正逐渐被汉族人超过。例如，在1949年，新疆人口中只有6%是汉族人，而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38%。在西藏自治区，人口仍然以藏族人占多数，但在以藏族人和蒙古族人为主的青海，汉族人口已经由1982年不到40%上升至2010年的53%。

在乌鲁木齐和拉萨等城市产生的新财富，大部分都流向汉族居民，而这正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观点。虽然他们指出语言往往是汉族移民在当地就业的障碍，但他们同时亦批评了当地在授予合同和招工时所固有的种族主义现象。这不仅代

表收入和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增加，而且意味着现在的不平等现象与民族身份是密切相关的。这样的社会经济分层让许多非汉族人意识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好处不成比例地流向汉族人。当阶级和民族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大家都知道它们对社会造成的风险。

对于当今中国民族关系紧张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解释是，汉族人和非汉族人对现代中华民族的定位截然不同。简而言之，大部分汉族人都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而非汉族群体则大多认为自己首先是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蒙古族人、壮族人、朝鲜族人等，其次才是“中国人”一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此，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其根源就是要确保汉族人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人——对大多数非汉族群体并无益处，而且在涉及包容性的国家计划中，也无法取代共产主义。

解决办法是什么？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族问题加剧，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解决办法。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马戎提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建议，就是彻底消灭“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这个概念，然后改称“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这包括在宪法中删除有关“民族”的字眼，从个人身份证中删除民族身份，并追循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模式，使每个人都可以在所谓的大熔炉中自由地认定自己的身份。尽管马戎的提议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担心，鉴于中国司法体系薄弱，少数族群未能享有太多的法律保护。他们还指出，即使在美国，这种模式也有短处。

另一个解决方法——正如前面所说，已经在进行——就是改变人口分布，使非汉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变成少数。鉴于1.12亿

非汉族人口中，只有大约10%（1200万）是属于抱有严重不满的群体（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并非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选择，尤其是如果再配合鼓励汉族定居男人与非汉族当地妇女通婚的措施，正如一些官员最近建议般。这种人口变化的最终（未说明的）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在事实上消失。然而，事情可能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因为现在的数据显示这些地区的汉族人口正逐渐下降。

最终，如果非汉族人认为正在推行的政策是在对他们进行压迫、推进以汉族为中心的进程，以及在破坏当地语言、习俗、宗教机构和生活方式的长期生命力，我们就难以想象如何能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只会变得更糟，直至有一天政府不能控制冲突，或者再也没有藏族人、维吾尔族人或蒙古族人来抗议。

另一方面，如果能够为人民提供充分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空间，使他们能够自由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完整的中国公民，同时又是藏族人、维吾尔族人或蒙古人，那么就可能会找到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实际上，权宜之计就是要找出一个办法，不但令大部分中国人，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都能够接受，而且还能保存中国非汉族人民的伟大文化，避免它永久消失。这样的蓝图是存在的，而且已经写入中国宪法里。